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南怀瑾 著述

(下册)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下册）

南怀瑾 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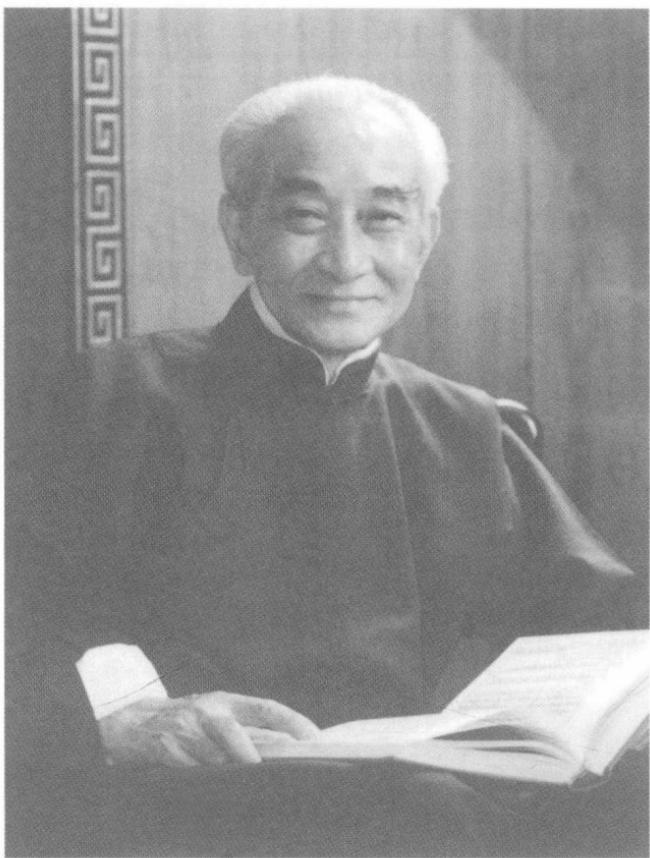


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
自有覺聖智
完成人格

辛卯年二月
九霞齋主

南懷瑾





出版说明

南怀瑾先生常谓：立国之本是文化。中华民族历经千年万载，文化渊远流长，在新世纪到来之初，世界瞬息万变，炎黄子孙又该何去何从？

本书为南怀瑾先生于二十一世纪初应各方邀请之讲课记录，内容涉及广泛，但终不离文化之根本；除突显众所关心之话题，更望能唤起读者对文化教育之重视。

本书原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兹经版权方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将老古公司二〇一二年五月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三月

前 言

在纷纷扰扰的世事中，我们迎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有句古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明人事多变，环境多变，而最令人心惊的，是人心的多变。

南师怀瑾先生常谓：立国之本是文化。中华民族历经千年万载，文化源远流长，在新世纪到来之初，正值世界瞬息万变之际，炎黄子孙何去何从，不免令人茫然若失，徒呼奈何。

南师先于世纪之初，因感文化教育之重要，撰文自诉，即上册第一篇“中国文化教育的自诉”。文中，南师从远古夏商周说起，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教育、生活，以及与政治、经济交互影响所产生的演变，叙述清晰扼要，发人深省，令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后因南师又屡经各方敦请，遂随缘讲课，内容涉及广泛，但终不离文化之根本。现将各篇讲记整理，集结成册出版，一则突显众所关心之话题，二则以飨长年热心的读者朋友。并盼大家为文化故，有志一同，则光明之前景，必定在望矣。

刘雨虹 记

二〇一二年四月庙港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一 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	
师儒之道的由来	2
师儒之道的分歧与衍变	4
秦汉阶段	4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6
宋明理学的兴起	6
明清时期的儒林	7
二 谈中学与西学的体用问题	
第一堂	12
开场白	12
百年的人与事	13
龚定盦的预言	14
戴鸿慈的资料 蒋梦麟的说法	16
西学为体的百年	19
西方的毒害	21
第二堂	24
认知科学与唯识	25

想是想 思是思	26
三世与因缘	27
意识 健康 梦境	28
第六意识的复杂作用	30
性理与理性	32
第三堂	34
中国文化与生命科学	34
静坐修养 端容正坐	37
修定的三个方法	40
听呼吸的方法	41
观心法门 三际托空	43
解疑释惑	45

三 经史合参研读班前言

炎黄子孙的起源	54
尧舜禹的公天下	55
夏朝开始的家天下	57
观今宜鉴古	58
治史要通才	60
六经皆史	61
孔子著春秋	62
春秋的内涵	63
司马迁著《史记》	65
读历史的眼睛	65
《史记》列传的深意	67
历史不是“载之空言”	68
四首诗说项羽	69

四 谈人性的真相

第一堂	74
人类文化的心性问题	74
人性是善是恶	76
中外各家的观点	77
知行的问题	80
王阳明四句教	81
四句教的矛盾	83
第二堂	85
佛家的说法	86
禅宗六祖	87
两首偈子	89

五 谈如何学佛

第一堂	94
佛教 佛学 佛法	94
佛的出身 佛的疑惑	95
佛的苦修与悟道	98
佛学中的宇宙观	100
佛学怎么看生命	102
因果轮回	103
第二堂	105
贪 嗔 痴 慢 疑 恶见	105
十善业道	107
答问解疑	110

六 谈神通与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不特异	114
是神通，还是神经	118
神通无用，价值有限	121
神通扭不过大势至	124

七 谈“照明三昧”

引言	132
绝利一源 用师十倍	134
在黑暗的光明中	135
照明三昧——生命的功能	137
对话与答问	140

八 漫谈商业道德

第一堂	148
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	149
什么是中国文化	151
出国看门道	152
要对商业反思	155
正确理解“重农轻商”	156
第二堂	160
居安思危了么	160
中国的传统美德遗失了	162
自我管理与管理人事	165
财富的用途	166

九 谈文学与修养

第一讲	172
失心疯的社会	173
学习文化 注意文学	174
韦应物的诗	175
刘克庄的词	177
谈性情	179
第二讲	182
文化的重要性	182
谈思想	183
什么是真正的学问	185
第三讲	188
初学静坐的要点	188
不要怕思想情绪	190
修养仍须配合文学	193
附录：国学与中国文化	195
第一堂	196
第二堂	214
第三堂	231
第四堂	244
南怀瑾先生著述目录	257

一

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

南怀瑾 二〇〇二年初于香江

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千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在本质上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师儒之道的由来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

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然后，是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于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从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的分歧与衍变

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是，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是，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但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则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五〇九—四六八年）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个时期也就是后世认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荀卿）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在由孔子所订

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是，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我们如果能在前后《汉书》中，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见解的异同，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厌旧；而北方的学者却守旧而疑新，甚之，还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多伪。在此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互相掺杂的开放思想，学问主流从儒学的六艺转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在此时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既有雄浑潇洒的豪气，亦不乏风流倜傥的韵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关于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大多厌倦时势，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宋明理学的兴起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似宋朝如此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